

為，即使是非法獲得的檔案也有新聞價值，因此地方行政長官將其情報網絡擴展到京城。《京報》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收集，如私人編撰的「小抄」，可能就敘述了未經批准的情報或是更具批判性的觀點。第三章關注銷售市場與《京報》的聯繫。國家不可能覆蓋編輯、出版和印刷的所有環節，因此官員及其商業代理人建立了靈活的關係。

第四章關注《京報》的官方讀者與清朝的政治文化。接觸《京報》的訊息是清代官員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收集並分析《京報》，對國家層面的政治訊息進行解讀，做為處理行政事務的建設性參考。第五章從國際視野探究《京報》，關注全球範圍的《京報》讀者。近代以來，新的通商口岸開放促進了中外貿易聯繫，西方國家和媒體陸續出版《京報》譯本，並將《京報》做為認識中國的資訊來源之一。《京報》也受到來華旅行者和收藏家的青睞。但 19 世紀後半葉清廷在政治軍事上的失敗，使各國媒體將《京報》當成一個衰落國家的紀念物，藉此諷刺滿清政府的無能。

第六章關注現代商業報紙對《京報》的挑戰。19 世紀後半葉新聞報紙迅速擴張，挑戰了《京報》的象徵性權威。透過商業報刊而非《京報》以閱讀全國新聞變得十分普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京報》的衰落。在尋

找國族認同的現代商業媒體環境中，《京報》被認為是精英的素材與政府利益的喉舌，無法為強大國家的誕生做出貢獻。因此，《京報》長期以來的行政功能、廣泛受眾和政治意義並未得到正確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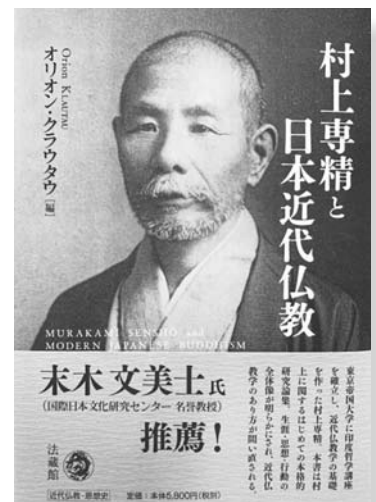
結語深入探究《京報》的意義。傳統觀點低估了中華晚期帝國裡政治意識在官方領域內外的可能性，作者認為，《京報》為研究政治意識的出現提供新的視角。清廷對合法性的要求涵蓋有限的透明度，批准《京報》出版就是其中一環。通過閱讀《京報》，從官方到非官方的讀者群得以瞭解國家運作。官方媒體將國家描繪成清廷所希望呈現的樣子，強調清廷的可取之處。但讀者也會認識到清廷明顯的失能，現實與《京報》之間的落差使讀者的政治意識得以增強，因此清朝獨特的信息秩序推動了政治意識的發展。

本書利用在亞洲、歐洲和美國等地收藏的《京報》進行研究，關注《京報》的政治、行政與文化角色的連續性及變化，以及《京報》如何推動清代政治文化的重大轉變。《京報》既然是瞭解清朝政治的重要窗口，對於想要瞭解當時媒體、訊息和國家權力之間關係的讀者來說，本書是必不可缺的讀物。（歐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碩士生）

村上專精と日本近代仏教

オリオン・クラウタウ (Orion Klautau) 編
 京都：法藏館，2020
 370 頁，ISBN 978-483-1855-61-9

19 世紀中葉被視為是日本歷史上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時期，日本結束二百六十



多年的幕府政權，迎來近代國家成立的明治時期。此一時期的日本佛教界，也面臨傳統佛教適應近代社會改造的根本課題。過去有關推動日本佛教近代化的研究中，缺乏對於村上專精這位活躍於明治和大正時代真宗大谷派佛教者的關注。村上做為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講座的首任教授之一，不但致力於東大近代佛教學的確立，同時也擔任大谷大學第五任校長，是真宗大谷派教團中不可忽略的人物，為何會被學者稱為「不被講述的佛教學者」（頁 257）？本書由執教於日本東北大學的 Orion Klautau 主編，他認為村上研究「不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為其所屬的大谷派是以清澤滿之一派代表「近代教學」為主流，村上的評價相對較低；二是比起創立東洋大學的井上圓了，和創辦武藏野大學的高楠順次郎都有全集與傳記刊行的情況，村上雖設立了東洋女子高等學校，但並非研究機關，研究成果相對不足。故日本學界首次專門以村上為主題而著成該書，提出日本近代佛教史中其人的貢獻與評價。

本書史料以村上的著作為核心，包括辻善之助、村上專精、鷲尾順敬共編的《明治維新神佛分離史料》；書末收錄村上多篇收藏在東洋女子高等學校的書簡翻刻資料，及〈村上專精著作目錄·年譜〉。全書除序章與終章外，主要依研究類型區分為三部八章：第一章探討幕末維新时期，在大谷派盛行的護法排耶論修學環境中成長的村上，效法井上圓了採用哲學與科學的「實學」方式抵抗基督教，更具體地致力於現實性、實用性、合理性、實證性、實踐性，以及社會性與公共性的「活學問」，導致他在東大開設印度哲學講座。第二章以村上的《活用講述因明學全書》為主軸。因明學是印度佛教論理學傳統，村上的因明學會通重視實用的雲榮晃耀與大西祝的哲學研究，以超越佛教達到更廣泛領域的「活用」為目標，《全書》也體現了明治時期因明學的特色。第三章著眼於村上的《佛教統一論》，其本質並非大乘是否為佛說的問題，而是以歷史的實證性為基準，重視

自由探討的態度與各宗教客觀的比較研究。第四章探討村上的「大乘非佛說論」。為了證明「大乘才是佛說」的議論，村上從佛身論的觀點，主張大乘在教理上無疑是佛說，這對於近世以來的大乘非佛說論，也存在有除去佛教徒們不安的目的。第五章考察村上以大乘非佛說為前提的佛教統一論思想，曾受到來自於宗門保守勢力的反擊，晚年的村上卻反過來攻擊革新派金子大榮的教學。作者認為，最終糾彈《佛教統一論》的並非宗派思想家，而是村上本身。第六章討論日俄戰爭後，因戊申詔書的影響而盛行的修養與人格培育言說中，創設東洋女子學校的村上其女子教育和修養論的內容。對於苦學立身的村上來說，修養的訓練貫徹在日常生活，提倡高尚的人格皆依自身修養而得，修養的最終目的是超越世俗歸於理想世界。第七章圍繞村上與其弟子常盤大定的〈東京帝國大學文學科內佛教科開設卑見〉，視察印度哲學講座開設的曲折歷程。作者推測講座開設的背景之一，是 1915 年日本政府對華的二十一條要求，看準即將在中國獲得布教權，為推進佛教研究是其設置契機。第八章探討《明治維新神佛分離史料》之編纂背景與思想性，該書也是村上佛教史學集大成之業績。從基督教批判的歷史認識文脈審視，村上強調佛教在國家中存在的意義，其佛教史學的精神深藏「對國家的忠義心」，並提出「理論的研究」和「實用的布教」是佛教史研究必要的理由。

總結所述，本書以村上研究為軸心，以近代佛教學、比較宗教學，以及儒教的合理性等方法論，描繪出村上的總體形像，可視為日本村上研究史上決定性的一本著作，展現傳統過渡到近代的佛教思想與社會的緊密聯繫，以及佛教內部保守與革新之間相互的角力，更提供近代佛教史研究嶄新的視角，對吾人理解日本的「近代」與佛教具有啟發意義。（倪管婷，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